

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 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喻 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中国的共和政治是怎样萌生的? 梁启超是亲历者, 是见证人。中国走向共和的实践过程, 就是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这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从甲午到戊戌, 是梁启超共和思想的萌芽时期, 也是中国共和的萌芽阶段。从戊戌到辛亥, 梁启超经过反复的探索, 逐渐选择了“虚君共和”, 也是中国探索“虚君共和”的实践阶段。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促成了中国的共和政治, 也推动梁启超完成了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清末民初的共和革命既深刻地塑造了梁启超的共和思想, 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共和在萌生之际的精神实质。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堪称中国走向共和政治的思想镜像。

关键词: 共和政治; 共和思想; 梁启超; 思想镜像

中图分类号: D9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4) 05-0199-10

中国的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在当代中国数量庞大的法学专业文献中, 以中国的“共和”为主题的学术论著却不多,^① 与“共和”这个主题的重要程度极不相称。这种关于共和的理论贫困状况, 不利于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国家与法”, 不利于创造性地阐述当代中国“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中国共和的萌生做一些研究, 以阐释中国共和的起源。

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中国走向共和的实践过程, 与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在时间维度上, 几乎是同步展开的。中国走向共和的曲折性、复杂性, 与梁启超共和思想的曲折性、复杂性, 恰好彼此呼应。一方面, 中国共和的萌生过程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形成过程; 另一方面,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活动亦反映了中国共和的萌生。这就意味着, 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恰好可以在“词”的层面上, 映照出“物”——共和萌生的实践过程, 两者之间恰好呈现出“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因此, 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恰好可以充当中国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

虽然早在 1895 年, 梁启超就积极参加了抗议《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 参加了《中外纪闻》的编辑工作, 协助康有为创办了强学会, 并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思想旅程。但是, 1896 年也许才是梁启超独立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年的 8 月 9 日, 梁启超作为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以这份报纸作为平台, 梁启超不仅卓有成效地传播了以“变法”为核心的思想观念, 同

作者简介: 喻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法理学。

① 代表性的专题论文主要有: 杨君佐 《共和与民主宪政》, 《法律科学》2000 年第 2 期; 常安 《“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 《宁夏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 卞修全 《君宪、共和之争与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 《法学家》2008 年第 4 期; 章永乐: 《共和政体与国家建设: 中国近代宪政史反思》, 《中外法学》2012 年第 1 期; 王书成 《立宪共和之民初启蒙及反思》, 《法学研究》2011 年第 5 期, 等等。

时也让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在此后的三年间,梁启超通过“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湖南应办之事”等诸多广为流传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集中论述了三个关键词:民智、民权、民政——梁启超牌号的“三民主义”。

把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分别阐述的民权、民智、民政归纳起来,就可以组合成为一种相互关联的“三民主义”。三者之间,需要首先完成的任务是开民智,因为开民智是兴民权的基础和条件;至于民政,则可以视为民权兴起之后的结果与归宿,是民权埋葬君权、民权取代君权之后的政治形态。因而,三者的逻辑顺序,就是“三步走”:从开民智,到兴民权,再到求民政。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梁启超早年的“三民主义”虽然不同于孙中山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但是,它却反映了梁启超在思想上走向共和的早期历程。虽然,这个阶段的梁启超还没有直接提出“共和”的概念与理论,但是,无论是民权、民智还是民政,其实都是共和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都构成了支撑共和政治的基本要素。换言之,梁启超在甲午至戊戌期间论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体现了共和政治的价值追求与核心内容,既反映了梁启超的共和思想在萌芽阶段的图景,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的共和政治在萌芽阶段的图景。

一、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虚君共和”思想的逐渐形成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中国一直有君主。但是,共和政治的因子也在逐渐萌生,一方面,民智渐开,民权渐伸。另一方面,清政府设立了仿议会性质的资政院,颁布了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再一方面,革命党人的革命行动就像清政府的改革措施,时而兴起,时而歇息。正是在这样的走向共和的起伏过程中,正是在这种既有君主同时也在培育共和因子的实践过程中,梁启超逐渐形成了“虚君共和”的思想。

在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的共和思想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萌芽状态中的“三民主义”却像一只目标明确的、一往无前的、已经离弦的箭:以民智培植民权,以民权支持民政,以民政取代君政。然而,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发生,“新政”旋即烟消云散,梁启超从庙堂上的政治维新者顿时变成了朝廷缉拿的政治逃亡者。从戊戌到辛亥,在十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中,梁启超的生活世界、政治世界与思想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简洁明快的、直线型的“三民主义”,很快就被“之”字型的、左右摇摆的思想困厄所取代:时而反对共和,时而主张共和;时而共和革命,时而虚君共和。因而,梁启超在流亡海外(主要是日本)期间的思想探索,就给时人及后人留下了反复无常的印象。对于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呈现出来的“之”字型的思想历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予以叙述。

第一阶段(1898年10月至1899年3月),以民智未开为由,主张缓行“民政”。

代表性论著是1899年3月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针对“政府腐败,不复可救,惟当从民间倡自主独立之说,更造新国”的激进观点,提出了保守而谨慎的主张“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义,然当孩提之时,则不能不借父母之保护。今日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时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②

^①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7页。

^② 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这段话的落脚点是“保皇”，旨在“力挺”已经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其实也是在抨击当政的慈禧、荣禄等人。在这段话以及这篇文章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梁启超所属的帝党与后党之争。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虽然这篇文章提出了缓行“民政”的保守观点，虽然强调了在民智未开、民力不够的情况下不宜倡导“民政”，虽然为“民政”泼了一盆冷水，虽然从戊戌前的“激进”变成了戊戌后的“缓进”。但是，这篇文章依然承认民政、民权、民智的正面价值，依然坚持从民智到民权、再到民政的“路线图”。

第二阶段（1899年夏秋至1903年4月），同情革命党人，主张“改造共和政体”。

1899年夏秋之际，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开始密切交往。由于受孙中山的影响较大，梁启超对革命产生了认同，俨然已是革命党人的同路人。此间，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①显然，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共和主张。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对“今上”继续保持着较高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已经不再是对一个君主的认同，而主要是对一个昔日的“维新战友”的情感认同。1900年，梁启超致信孙中山，又提出了一个迂回的共和方略“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即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②

梁启超一方面坚信“民政”与共和（“举皇上为总统”），基本上同情孙中山的立场；另一方面，则跟他的老师康有为拉开了距离。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盖‘自由’二字……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③

在这里，梁启超不仅重申了“兴民权”，而且还把民权与民智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颠倒：此前在论述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时，一直都强调民智是民权的前提条件。但此时的梁启超却倒果为因，认为只有兴民权，才可能开民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把与民权相关联的自由作为救时的“不二法门”，换言之，自由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④1902年，梁启超进而提出“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天之生人，权利平等”，“人之意志，各有自由”。^⑤1903年4月，梁启超又致信朋友，说“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⑥这些言论表明，这个阶段的梁启超对于共和革命怀有高度的认同感。

第三阶段（1903年6月至1905年底），鉴于外来学说与本土现实，提出“告别共和论”。

1903年6月，由于“苏报案”告密一事，^⑦梁启超对革命党人及其政治主张失去了信心。8月19日，梁启超哀叹“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弟近数月来，惩新党弊

①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3页。

② 梁启超《致孙中山》，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928页。

③ 梁启超《致康有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932页。

④ 这是模仿梁启超自己的表达方式“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详见《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55页。

⑤ 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0页。

⑥ 梁启超《致徐君勉》，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943页。

⑦ 上海“苏报案”的发生，梁启超认为系吴稚晖告密所致，正如他在给蒋观云的信中所言“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指吴稚晖）事，弟初睹甚骇怵……”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页。但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章太炎、邹容的被捕是否由于吴稚晖告密所致，尚难论定。详见徐中煜《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2—105页。

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① 11月18日，他致书康有为，称“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②

梁启超对革命党人感到失望，进而疏离革命主张，“苏报案”是一个现实的原因。相比之下，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的政治理论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伯伦知理的政治学告诉梁启超：共和政体需要人民具备共和的德性，譬如，“不惜牺牲其力其财，以应国家之用；且已籍普及之学制，常受完备之教育”。至于美国的共和政体，“以自助及相济两主义为安居乐业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实根于此”^③。波伦哈克的政治学又告诉梁启超“共和政体，惟有一种结构特别之国家，可以行之而无弊端。其结构云何？则奉同一之宗教，集同一之民族，其社会上各种利害之关系，不甚冲突。而其最要者，曰国境甚狭。”而且，“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④。

两位异域政治学家的理论学说让梁启超惊慌失措，他承认“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因此，根本就没有建设共和政治的前提条件；而且，以革命的方式求共和，还会带来更多、更大的危险。“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⑤ 这就是著名的“告别共和论”。在这个时期的梁启超看来，共和政治虽然总体上很美好，但是，它距离当时的中国太遥远，几乎就像天边的云彩，遥不可及，只好发出“告别共和”的哀叹。此外，“最使梁感兴趣的是伯伦知理的这一观点，即共和制度由于通常受变幻莫测的公民意愿支配，往往难以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⑥，这个观点让梁启超确信，以中国现有的国民状况而选择多数政体（共和政体），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⑦

从思想根源上看，梁启超之所以提出“告别共和论”，如上所述，有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对国内革命党人的失望，二是对国外政治学说的服膺，三是对中国国民资格、历史传统的认知。除此之外，“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劝诫”^⑧，也促成了梁启超的“告别共和”论。

第四阶段（1906年1月至1907年初），受笈克彦的影响，转向“开明专制论”。

1906年初，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开明专制论”，在这篇影响颇大的文章中，梁启超主张“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⑨ 何谓开明专制？梁启超把它与野蛮专制进行了比较和对照“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譬如，“普王腓力特列曰‘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此语也，则代表开明专制之精神者也”^⑩。换言之，执政者如能以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作为追求，就是开明专制。

为什么要实行开明专制？梁启超提供的理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说，君主专制政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8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2页。

③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70页。伯伦知理，亦译布伦奇里（Bluntschli，1808—1881），德国公法学家。

④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73页。波伦哈克（Bornhak，1861—1944），德国政治学家。

⑤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74—1075页。

⑥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⑦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88页。

⑧ 董方奎《梁启超为什么放弃美式共和方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⑨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71页。

⑩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56页。

体不可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变成共和立宪政体。“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此其理，德人波伦哈克之说，最能为确实的证明。”^①可见，梁启超做出这个判断，源于对波伦哈克理论的服膺。第二，中国民智未开，不可能建设共和政治。“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也。吾于是敢毅然下一断案曰：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宪制者也。”^②因而，第三，无论是通过立宪，还是通过革命，都不可能走向共和政治。因为“宪法者，决非一纸空文所能立，朝欲之而夕致之也……彼持极端破坏论者，乃谓于干戈倥偬、血肉狼籍、生计憔悴、神魂骇丧之余，不数年而可以跻于完全优美之共和，一何不思之甚！呜呼，我青年之眩于空华、困于噩梦者，其醒耶未耶？而附和君主立宪者，亦一若于数条宪法正文之外，更无余事，其可怜而可笑，亦正与彼破坏论者相类”^③。这就是说，借助于破坏性的革命，绝不能走向“完全优美之共和”；单凭几条宪法正文，也不能实现“完全优美之共和”。之所以提出“开明专制论”，梁启超自己承认的思想动因是“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马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④按照这句“夫子自道”，梁启超所倡导的开明专制，实际上是对马克彦学说的因袭，^⑤是日本法政思想及其实践强烈影响下的产物。

第五阶段（1907年夏至1911年11月），根据国内政局，提出“虚君共和”。

1907年9月，清政府决定设立资政院，这种形似“议院”的机构似乎让梁启超看到了新的希望。10月，梁启超主导的“政闻社”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梁启超为这个政治团体拟定的宣言是“改造政府”，“亦曰改无责任之政府为有责任之政府云尔。所谓有责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对君主负责任言之，乃以其对国民负责任言之”^⑥。这样的政府，“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⑦。梁启超设想的这种政府，由于仅仅对国民负责，不对君主负责；虽有君主，但君主无实权——这样的政体，其实就是“虚君共和”政体。

这种“虚君共和”政体，甚至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梁启超依然念兹在兹，不忍舍弃。1911年11月，亦即武昌起义的次月，梁启超写出了著名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认为，“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顾等是共和政体也，其种类复千差万别，我国将何所适从，是当胪察其利害，而慎所择也”^⑧。梁启超列举了六种共和政体：美国式的，法国式的，墨西哥式的，瑞士式的，英国式的，澳大利亚式的。比较而言，英国式的“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此制滥觞英国，全由习惯积渐而成，其后比利时著之成文宪法，遂为全欧列邦之模范”^⑨。换言之，在多种共和政体中，“虚君共和政体”实在堪称最良的共和政体。

梁启超虽然认为，“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

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70页。

②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79页。

③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86页。

④ 梁启超《致蒋观云》，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949页。

⑤ 马克彦（1872—1961），日本公法学家，神道思想家。

⑥ 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11页。

⑦ 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713页。

⑧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37页。

⑨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41页。

望……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①可见，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即使梁启超承认中国应当采用共和政体，但是，他所希望的共和政体依然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依然在为“虚君共和”之不能实行而感到遗憾、感到惋惜。梁启超对于“虚君共和”的依恋，源于他对英式政体的一贯认同。

以上分析表明，从戊戌到辛亥，十四年间，梁启超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进行了反复的探索，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思想道路。其间，既考虑过共和革命，也考虑过开明专制，但在他流亡生涯的最后阶段，却选择了一条介于共和革命与开明专制之间的“虚君共和”之路。梁启超这十多年间的思想历程，正是中国在政治实践中走向“虚君共和”的真实写照。

二、辛亥革命对梁启超共和思想的塑造

从甲午到戊戌，梁启超宣扬了他的以“民政、民权、民智”为内容的“三民主义”，但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正面提出共和政治的主张，只有共和思想的萌芽，原因在于，在这个阶段的中国政治实践中，共和政治还未萌生，仅仅出现了共和政治的某些胚芽。

从戊戌到辛亥，十多年间，梁启超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虽然短暂地认同过共和革命的主张，但是，他的主导思想还是承认君主的正当性。此间，他虽然提出了多种相异的政治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虚君”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探索。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时期，中国走向共和的历程还处在“虚君”阶段。由于一直都有君主，中国的共和政治实践只能在君主存在的前提下，筹备议会，制定宪法，逐步培育共和政治的制度因子。

只有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既促成了中国的共和政治，同时也让梁启超彻底地、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共和，完成了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试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如果共和政治没有形成，梁启超将会始终徘徊在君主政治的世界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及其缔造的共和政治，乃是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津渡或桥梁。辛亥革命既然把梁启超从君主政治的思想天空引领到共和政治的思想天空，辛亥革命的性质也就从根本上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特质。

辛亥革命的性质或特征是什么？传统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然而，更具体、更准确地说，“辛亥革命不是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自强救亡运动”，因为，“1895年，由于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割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打破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的平衡均势，引发了一场西方列强在中国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这一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这场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③。

作为一场自强救亡性质的运动，辛亥革命既促成了共和政治，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梁启超的共和思想。因为，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本质上就是寻求自强救亡的思想历程。在上文分别阐述的三个不同的思想段落中，梁启超对于“三民主义”的呼吁，对于“虚君共和”的曲折探索，对于共和政治的守护与捍卫，都包含着一个未曾改变的思想内核，那就是自强救亡。

如前所述，早在1896年的《古议院考》一文中，梁启超开篇就问“泰西各国何以强？”在同年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梁启超把变法的目的归结为“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如

①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4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66页。

③ 史金生《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特点》，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论文集编委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论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果拒绝变法，所引起的消极后果，“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①！换言之，只有通过变法，才可能自强，才可能救亡，否则，将会大难临头。这些言论，极为精准地表达了梁启超在甲午至戊戌期间的心迹：以自强救亡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

在戊戌至辛亥期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短暂地认同过革命党人的主张。1899年，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同年，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又说“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②可见，梁启超认同共和革命的理由，依然是“挽救危局”。

在流亡生涯的多数时期，梁启超的基本倾向是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但是，“虚君”的目标依然是自强救亡。他在论及“虚君共和”的旨意时写道“凡立宪君主国之宪法，皆特著一条，曰：君主无责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要求君主无责任？原因就在于，“一国之元首，惟无实权者乃可以有定位，惟无定位者乃可以有实权，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国。混而兼之，国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于今日物竞天择之场者也。善哉，君主无责任”^③！换言之，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只有坚持“虚君”，才能让国家站立起来，才能让国家自存于物竞天择的“新战国时代”。

梁启超认同自由，但认同自由的理由却是：自由二字“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梁启超也认同法治，但认同法治的理由依然是自强救亡，因为，“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④。梁启超还认同过开明专制，但开明专制的价值与功能依然在于“救中国”——“因陈烈士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来所怀抱之意见也”^⑤。可见，颇受世人诟病的“开明专制论”，同样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内核，那就是“救中国”或自强救亡。

在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中，时而强调“共和革命”，时而强调“开明专制”，时而强调“虚君共和”；时而强调民权，时而强调自由，时而强调法治，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思想历程。按照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习惯于“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⑥。然而，如果把梁启超的这种“反复”、“矛盾”甚至是“流质易变”的思想轨迹放置于“自强救亡”这个平台上来观察，就可以理解了：他关于共和的多种取向，其实都是在“方略”层面上的斟酌；不同的方略都在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自强救亡。^⑦换言之，梁启超的共和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以自强救亡为本位的政治法律思想。然而，追根溯源，这种以自强救亡为本位的共和思想，绝不是梁启超从学术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梁启超置身于其间的辛亥革命的自强救亡本性所塑造出来的。

辛亥革命的性质不仅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特质，辛亥革命的过程还影响了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

辛亥革命虽然是在1911年发生的，但是，孙中山的兴中会早在1894年就成立了，可见，辛亥革命的种子早在甲午之年就埋下了。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因此，自甲午以后，革命力量的积蓄、革命意识的深化、革命方略的调整，一直都没有间断过。换言之，革

①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③ 梁启超《政治学理摭言》，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16-917页。

④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55页。

⑤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51页。

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00页。

⑦ 梁启超思想的易变，其实也是情势使然。1901年，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已有描述“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府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5页）。换言之，在“过渡时代之中国”，旧政体已经坍塌，新政体尚未组织，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这样的政治背景，是梁启超反复修正自己思想的总根源。

命虽然是在辛亥之年临门一脚地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成功的背后,却经历了十多年的酝酿、曲折、试错、奋起。可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实实在在地走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这一历史行程,恰好可以反映出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梁启超对共和政治的探索,同样始于甲午之年。当孙中山在海内外为革命奔忙的时候,梁启超也在海内外广泛宣传改良与变法、积极开展组党活动。在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有分歧,但也不乏共识,甚至还有密切的合作。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际,梁启超也迎来了他的英雄般的凯旋,并由此完成了他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从酝酿到成功的实践过程,与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梁启超共和思想的流变,正是辛亥革命的迅疾行程、清末政局的波谲云诡塑造出来的。辛亥革命的节奏,几乎就是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节奏。

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塑造了梁启超共和思想的特质;辛亥革命的实践过程,就是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正是辛亥革命,从性质与过程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塑造了梁启超的共和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及其历程,恰好可以成为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就托尔斯泰而言,“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①;同样,就梁启超而言,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辛亥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梁启超的共和思想虽然可以映照出辛亥革命的精神实质,但是,在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手段、途径等方面的差异。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表明,他的核心立场是以改良的方式实现自强救亡的目标,因而习惯于拒绝暴力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既然称之为“革命”,既然是由革命党人主导的,那就表明,辛亥革命包含了暴力革命的成份。从革命者的立场来看,梁启超的改良立场也许不能接受,也许应当批判。但是,如果我们暂时不从革命者的立场来审视,那么,革命与改良也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手段与方法——按梁启超的说法,主要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方略”。^②两者的终极目标其实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自强救亡。这是我们理解辛亥革命的钥匙,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共和思想的钥匙,同时,这还是我们理解中国共和政治在萌生之际的钥匙:辛亥革命促成的共和政治,乃是追求自强、寻求救亡的政治。“走向共和”的实质意义就是走向自强——这就是中国共和在萌生之际的精神实质。

三、百年沉浮:梁启超共和思想的意义追问

1921年,时值辛亥革命十周年,梁启超专门发表了一个演讲,论及辛亥革命的意义:“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作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作民主精神的自觉。”^③那么,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我们回望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样的追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①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载《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9页。

② 清王朝的覆灭及民国的建立,主要是革命党人革命活动的结果,但它同时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者“改良活动”的结果。武昌起义的枪声虽然很响亮,但是,单凭武昌起义中的那几枪,并不能终结清王朝。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势力与外国势力、革命势力与改良势力、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满族势力与汉族势力等等多种势力相互交汇、共同激荡的结果。此外,由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因此,张灏认为,梁启超到底“是一位革命者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都是一个疑问,“这种现象因为梁和他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轻率地滥用‘革命’和‘改良’的词句而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如果事先不在语义学上作一澄清,梁是一位改良主义者还是一位革命者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回答”。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

③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379页。

首先，他强调秩序与稳定。他把国体视为“天下重器”，认为国体“可静而不可动”的观点，就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与《老子》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理念^①，可谓一脉相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折腾”。也许是多年的政治实践经验，也许是对世界各国政治演进过程的反复比较，让梁启超意识到：随意另起炉灶，随意颠覆国家的根本，随意打碎国家的整体框架，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都绝非幸事。因而，更值得期待的是秩序而不是动荡，是“日常政治”而不是“非常政治”。较之于近代中国的“长程革命”，梁启超的“求静”主张，值得认真对待。

其次，他强调改良与建设。早在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就提出了从开民智到兴民权再到求民政的“三民主义”。这种一环扣一环的政治改良思路，着眼于理想政治的民众基础与社会条件，着眼于循序渐进的提升，着眼于点点滴滴的进步，包含着一种稳健的法政之道。按梁启超的说法，他自己“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②。这句自我总结，是对他的改良主义、建设主义共和思想的生动诠释。正是因为立足于改良与建设，梁启超对共和政治的追求，更多地着眼于“走向共和”的起点、步骤、环节、方法、路径，表达了一种程序主义的共和观念，依照哈贝马斯的“民主作为程序”的理路^③，不妨称之为“共和作为程序”。梁启超虽然在“共和是什么”这个本体问题上没有给我们提供详尽而系统的论证，但在“如何走向共和”这个程序问题、方法问题上，却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最后，他强调整体与系统。在梁启超的共和思想中，蕴含着一种整体主义的思路，即，共和政治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民智的开发、民权的兴起、宪法的完善、议院的设立，尤其是对于权力的有效制约，同时，还要考虑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多少，以及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制约性等等，因而，仅仅是把君主的宝座掀翻，并不能得到一种理想的共和政治。正是这种整体主义、系统主义的共和思想，让辛亥之前的梁启超对“毕其功于一役”的共和革命抱持某种怀疑的态度；与那些一心想着推翻君主政治的革命党人相异的是，梁启超更多地考虑到了共和政治的相关因素或配套因素。^④显然，这是一种更加缜密、更加周全的共和观念。从思想渊源来看，这种整体性、系统性的共和观念，受到了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的影响，与孟德斯鸠强调的“法的精神”^⑤也有相通之处。概而言之，梁启超共和思想中所蕴含的秩序观念、程序意识、整体思维，也许是这位立足于自强救亡的启蒙思想家给我们留下来的、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倘若有意“苛求古人”，那么，从学理的层面上看，梁启超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共和”的文字，但是，他并没有就共和这一主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阐述；他的几个核心观点都存在着若干可以商议之处。

譬如，他在辛亥之后，反复强调“共和”属于国体而非政体，这个论断就失之偏颇。因为，共和作为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既可以描述一种国体，也可以描述一种政体。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是把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来研究的。^⑥美国宪法第4条之第4项规定“合众国应保证联邦各州

① 《老子》第60章。

②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09页。

③ 详见喻中《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

④ 美国学者沙培德的研究还表明，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其共和思想中还包含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制衡的特点，“他早先关于推动提升国家权利的理论此时渐渐地和一种他新近了解的公共社会领域融和在一起”。详见沙培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的制衡》，张家钟、马小泉译，《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

⑤ 孟德斯鸠说“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和面积有关系……我将研讨所有的这些关系。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详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7页。

⑥ 譬如，亚里士多德说“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4页。

之共和政体”^①，言下之意，共和是一种政体。在流行的法学词典中，共和也被解释成为一种政体——一种“注重共同福利或利益，公众人人有发言权的政体形式”^②。按照孙中山的说法，“现在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不同，专制政体之主权，为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体三权分立，各有范围，三者之中尤以立法为要”^③。诸如此类的代表性文本，都是把共和当作一种政体来看待。当然，共和也可以表达一种国体，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华民国的国家与前清的国家不同，共和国体与专制国体不同。中华民国的国家是吾四万万同胞的国家，前清的国家是满清一人的国家。”^④可见，既可以在国体层面上谈共和，也可以在政体层面上谈共和。其实，在梁启超自己的论著中，也多次使用“共和政体”这个概念。^⑤然而，“走向共和”之后的梁启超却把共和仅仅归属于国体的范畴，排斥共和的政体属性，虽然事出有因^⑥，但从学术自治、逻辑严密的要求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

再譬如，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以为“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途辙”。^⑦这样的观点也有过于武断之嫌。革命造成的破坏与震荡固然存在，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革命也可能成为改良政治、优化政治的助推器——让梁启超惊艳的美国政治就是通过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建立起来的。事实上，革命所具有的破坏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像药品所具有的毒副作用一样（所谓“是药三分毒”），既然有毒副作用的药品在肌体患病的情况下能够产生治疗作用，那么，有破坏作用的革命在政治肌体出现严重病变的情况下，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治疗作用。梁启超囿于改良者的立场，因噎废食，完全否认革命的正面功能，则透露出梁启超共和思想上的某些盲区。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前半生的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枯坐书斋的专业学者。^⑧他作为一个自强救亡的行动家、实践者，他对于政治鼓动、社会宣传之实际效果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学术理论逻辑的追求。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于梁启超共和思想中的疏漏、片面、武断与矛盾，自然会多一些同情式的理解。^⑨

总之，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活动反映了其共和思想的萌生。梁启超走向共和思想的历程，恰好可以充当中国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而共和的真正形成，是由宪法确立的，是宪政下的共和。

责任编辑：朱志峰

①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2页。

② 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

③ 孙中山《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说》，载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④ 孙中山《在山西实业界学界及各党派欢迎会的演说》，载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504页。

⑤ 譬如，前文已经述及，在1899年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就提出了“改造共和政体”的要求。在1912年的《宪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中，更是将“共和国体”与“共和政体”两个概念同时使用。详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60页。

⑥ 梁启超“不论国体”的旨意，或许在于强调：共和国体不能再质疑，也不容再讨论，因而可以视为一种维护共和政治的修辞。

⑦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612页。

⑧ 大致说来，梁启超的前半生“以政治为业”，后半生“以学术为业”。1918年，可以视为梁启超从“政治活动家”转向“学者”的标志性年份。有一个细节值得在此一提：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由上海起航，赴欧洲游历，临行之前，他“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4页。

⑨ 本文赞同范忠信的说法“在那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我们的确不能苛求梁先生和其他法学家，我们无法苛求古人。”详见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